



# 中西方「中共研究」的偏態

——兼評「中共研究方法論上的幾個問題」

趙建民  
(本中心副研究員)

76.2.15

~~~~~

編著者：Amy A. Wilson, Sidney L. Greenblatt, Richard W. Wilson

書名：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

出版者：Praeger, New York

出版時間：一九八三

頁數：一三六頁

~~~~~

西方學術界對中國的關懷，在大陸淪陷以前，似乎僅止於賽珍珠筆下的龍的世界，而有系統的、經過整理的、嚴肅的學術出版，以介紹此文明古國於世人面前的著作則付闕如。各國對於中國的瞭解，在這種情況下，難免瞎子摸象，各有不同，也因此，憑添了中國在其他民族與學者心目中幾分神秘的色彩。

自神州變色、亞洲幾經風雲之後，西方知識界似乎才如夢初醒，認識到且注意到此一龐大古國的學術價值，開始寫作出版。歷經近四十年的摸索與努力，成就可謂非凡（至少以從事研究人員數量與其產品數目而言）。理論上，神秘中國的面紗已被掀起了，世人對中國的認識應該超過馬可波羅遍地黃金、或基督教傳教士滿腔理想式的對中國的描述。事實上也確實如此，中國不再是西方極少數人的專利。不幸的是，一項神秘與迷思的結束，却是另一項絕然不同的迷思與混淆的肇始。今天西方所謂「中國學者」對中國的瞭解與意見，可以稱得上是歧異非常，有時候其一知半解而又自以為權威式的誤導，站在一自由中國人的立場，其所造成不利的影響，實遠甚於全無報導。更令人遺憾的是，這種偏差却不限於沒有中國文化

~~~~~

背景的西方文人，還包括了一些在中國接受過相當教育程度而後留洋的海外學人在內。

## 一、中共問題「研究途徑」的爭議

一直到今天為止，西方研究中共問題的學者仍然在找尋一條正確的研  
究途徑，根據學者詹遜（Chalmers Johnson）的說法，大多數學者所採用的研究途徑是錯誤的，即便選擇了合宜的研究途徑，研究方向也常自  
限於虛構層面，並未落實到實際政治運作層面①。

西方學者對於中共研究的困擾，除了上述研究途徑的「應」與「否」的問題以外，尚包括了研究途徑的選擇問題。這方面的紛歧更是驚人，自  
革命途徑、意識形態、官僚體系、發展模式、極權主義模式、比較共產主義、文化取向、衝突模式、派系研究、利益團體、心理途徑、世代模式（generational approach）、民粹政權（populist regime）、馬列主義研究法、歷史研究法等等，真可說是琳瑯滿目，不一而足。比較起來，  
在臺灣的研究大陸問題學者的研究方式要單純的多，在最近幾年以前，大

體不出派系鬭爭和歷史分析相結合使用的範圍之內。雖然如此，美國方面學者到了八十年代，在白魯詢「中國政治的動力」一書問世以後，似乎也逐漸形成以派系鬭爭為主要的一項主要研究方法<sup>②</sup>。白氏在比較了官僚政治、地理政治 (geographic politics)<sup>③</sup>、世代政治、趨向分析 (tendency analysis)、和派系政治以後，認為權力仍為中共政治體系中各種政治資源首位，並且由於中共極權政治的特殊制度，以及中國傳統的人羣關係，使得派系模式居於中共研究的主導地位。

理論化與概念化的建立，是西方中共研究上的另一主要障礙。隨着行為科學的興盛，西方研究中共問題在六〇年代與七〇年代曾經大量引進行為科學理論與概念，然而却有學者主張中共研究根本不具備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條件，而大多數學者的研究成果只不過是情報蒐集的工作罷了<sup>④</sup>。社會科學之所以稱為「科學」，便因其具有蒐集「有系統」的資料，並因以創造有系統的理论模式的能力，使得研究人員在面臨龐雜的資料時，可以歸納、簡化而達到精簡的目的。此外，這種簡化的手續得以進一步精確化，使之具有解釋甚或預測類似現象的一種力量，期以自然科學之理論概括為依歸。若以此標準衡量，則似乎西方有關中共的研究出版大多與此理想相去甚遠，大抵皆以描述與分析等所謂情報式的研究為主。間或有理論化的努力，其方法論上的訓練、理論的層次、經驗資料的蒐集等都極為粗陋。但在另一方面，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學者更似乎連嘗試階段都未曾開展。

## 二、價值判斷影響研究

西方的中國事務專家的第三項可能偏差在於價值判斷方面。長久以來對於中國事務有興趣的西方學者、傳教士、外交官、小說家等，他們一反其同胞對中國冷漠的社會主流傾向，對中國懷有極度好感與戀情。此種羅曼蒂克式的戀結，或可稱之為「中國情結」(China Syndrome)，是西方研究中國問題價值上可能偏差的第一種型態。由於這些人士對於中國固有文化的極度喜愛，常常因而忽略各種不同政治制度與理念，表現於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況當中，會有不同結果的事實。因而吾人常有機會閱讀西方研究中國問題學者包括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所謂的「大師」級人物在內的出版品，說明中共政權與傳統中國文化的關係，以及毛澤

東與歷代儒家君主的相似性<sup>⑤</sup>。

西方的中國事務學者價值上的另一項偏差，在於對於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的某些情緒性的不滿，有些學者認為國民黨的腐化與專制是導致大陸淪陷的主要原因。及至政府遷臺，這種觀念仍然普遍流行於許多西方學者當中。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經濟成就被譽為一項奇蹟，然而伴隨着政治、社會與經濟多元化而來的政治方面的進步却未受到應有的注意與重視。與此有關的，在大陸問題研究方面，中華民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和其所提供的有關中共的極具參考價值的原始文件，也沒有得到西方的正面評價，甚且在七〇年代中期以前，美國學者拒絕採用中華民國學者的出版品<sup>⑥</sup>。與西方有關中國大陸的研究著作比較，中華民國此一方面的作品因為種種因素使然，文字難免流於情緒化，然而其於過去大陸情勢的研判、分析、或預測，皆要遠較西方產品為優越。

有關價值判斷的第三項偏差，見於美國學者賀蘭德 (Paul Hollander) 關於西方對於共產主義社會所存有的「一般偏見與嚮往，造成這種偏態的原因很多，從無知，到安全因素、種族主義、對大多數共產國家受過殖民統治的罪惡感，以及西方資本主義腐化的反動等等<sup>⑦</sup>。這一類的影響與表現，或可統稱之為「新左派」的勢力。在這種理念導引之下，共產式的社會主義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替代品，毛澤東的政治鬭爭與整肅被認為是向官僚主義開刀的表现，「上山下鄉」式的社會流離被視為「民粹式」的統治方式，財產公有制造成社會的普遍貧窮被認為是一種「平均主義」(類似三民主義均富思想) 的一項成就。

西方的中共研究第四項困擾在於語言、文字等研究工具的生疏。早期(主要在六〇年代中葉以前) 西方研究人員受到中國大陸封閉疆界的限制，研究資料極度貧乏。文革以後，大量地方或中央、正式或非正式消息的流出，又使得研究人員目不暇給，無從判定真偽。加上語言和文字上的限制，更增加了研究上的困難，斷章取義乃不可避免，乃有見毛澤東的「實踐論」講知與行的問題，與之王陽行「知行合一」學說相提並論等荒謬情事產生。

## 三、西方學者的自省

由名學者威爾遜 (Richard W. Wilson) 等編輯而成的中共研究方法論上的幾個問題一書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 Praeger, 1983), 雖名曰「中共研究」, 實則包含了臺灣、星加坡、香港以及中國大陸在內的幾個中國人居住的社會, 可以說是該書的一大特點。

所謂「方法論上的幾個問題」, 顯而易見, 編輯者只就某幾項彼等認為重要的問題提出討論, 全書雖然甚短 (僅一百卅餘頁), 其所涵蓋的範圍與層面却極為深廣, 包括了上述西方研究中國問題時的一些基本癥結所在。其中除了第一章綜合性的介紹以外, 所餘五章當中, 墨子刻 (Thomas A. Metzger) 與馬若孟 (Ramon M. Myers) 所集體創作的「漢學陰影」和西德學者杜勉 (Jurgen Domes) 「西方政治學界對中共的誤差」二篇文章, 對於西方過去的研究工作有所批評與反省, 份量不可謂不重, 這是該書的第二個特徵。

墨子刻和馬若孟把西方對中國的研究以共產革命並建立政權為界, 分為二個時期並予以評估。其中歷史部份又細分為知識界、社會政治史、和經濟史。此文的主要重點在於駁斥西方的中共研究中所提出來的最主要的二個理論模式, 亦即「革命模式」和「發展模式」的謬誤。

毛澤東的革命誠然引起整個國際舞台的相當震撼, 毛澤東思想更是早期研究中共並用以概稱為「革命模式」的主要內容。然而對於所謂「毛澤東主義」一詞, 却顯得草率定義, 以致於受中共術語的鼓動, 誤以為某些毛澤東所使用的名詞如民族主義、反傳統、反帝、社會主義、民主集中制、平均主義、羣衆路線、武裝鬥爭、不斷革命等的總和便是毛澤東思想的錯誤看法 (頁二十八)。受毛澤東思想和政策影響極大的「革命模式」, 便是基於這種認識以圖建立一理想的社會的理論嘗試。

二次大戰以後, 許多亞非新興國家崛起, 改變了原來的世界政治秩序和面貌。這些國家大多面臨政治經驗不足、經濟資源缺乏、內社會秩序動盪等多重問題, 如何「超度」這些落後國家以達富強康樂境地便成為政治學上一項重要課題。許多西方學者冀圖以西方已開發國家的經驗與模式作為改造新興國家的藍本, 因而有所謂發展與現代化理論的興起。此一理論應用到中國大陸的結果, 認為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領導階層, 為了追求

現代化, 政策不免搖擺, 此種搖擺乃是代表各種不同勢力競爭的結果, 在此過程中, 傳統並未扮演過多的角色。

墨、馬二氏對於此一理論模式也提出質疑, 認為吾人無法清楚予以界定, 同時, 現代化理論要求落後國家製造某些有利現代化的「條件」, 而這些條件的存在於否不易判定, 如何成就此等條件也不清楚。

墨、馬二人在批評此二研究模式之外, 也對西方學者語文能力的不足, 學術訓練的狹隘, 社會科學方法的濫用, 以及某些觀念上的偏差提出討論。

#### 四、社會科學與中共研究

中國以文化立國, 中國文化之於世界文明之影響可謂極為深遠。自中共竊據大陸以後, 一個迥異於前的共產意識形態的出現, 其所給予龐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的衝擊如何? 此一問題自然為每一關心中國局勢; 乃至於整個人類文明發展的人士所深切關懷。此外, 中共使用「文化大革命」字樣, 究竟什麼方式的大革命會把中國文化帶領何種境地, 更引起有心人士的好奇。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和中國文化間的戰鬥, 顯然對於未來中國文化的命運, 或許更為重要地, 共產主義是否可能被同化或者改造的問題, 激起了學者以政治文化的角度探討中共事務。此一努力始於六〇年代, 受行為科學研究風氣影響甚大。以政治文化探討共產社會, 也是對此一理論有效性的檢驗。假如共產黨人成功的改變了中國文化傳統, 顯然政治文化理論有其不足之處; 反之, 則政治文化理論可以獲得肯定。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迪特默 (Lowell Dittmer) 把西方以政治文化化研究中共政權的努力分為三個途徑。第一個途徑是漢學研究法 (*Sinological approach*), 認為傳統中國文化根深蒂固, 影響歷久不衰, 因此毛澤東的統治受到百姓支持, 一如過去中國人民之順從於王室一般。第二個途徑是外人直接觀察法, 由於他們觀察不夠深入, 因而有「面子」「權威危機」的名詞出現。第三種為社會科學研究途徑, 此法要比漢學研究法具經驗性, 也比觀察法有系統。社會科學中又可分為文化心理與文化人類學二個方面, 前者如白魯詢與其弟子所羅門<sup>⑧</sup>, 後者如傅萊德 (Morton Fried)<sup>⑨</sup>。迪特默顯然傾向於第二途徑, 而對前一途徑有所批判。

迪默特也就政治文化研究法中所遭遇的三個問題提出討論，第一個問題是傳統政治文化的性質與動力的問題，迪默特還以個人對傳統文化的評價的高低以及文化的持續與否，把學者分爲四類。第二個問題是馬克斯意識形態在中國適切性與其特質，迪默特認爲馬列主義爲了因應中國環境，必需有所修正，同時也對傳統文化造成摧毀的作用。第三個問題是政治文化與現實情況的問題，亦即社會化或是政治教化的問題，迪默特認爲中國文化並未遭受鉅大改變，亦即政治文化理論證明是有效的。

迪默特就政治文化作一方法上的探討，予以歸納並提出其中重要問題，其文雖非此一領域內之詳盡描述與全面評估，仍不失其重要性。然而渠之重點在於強調此一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因而忽略了此一理論所可能連代而有的限制與缺點，譬如說定義不易精確等，却未說明。

杜勉在該書第四章「西方政治學中國研究的偏差」一文，敘述西方研究中共同問題者，由於資料不足，因而產生了許多對於中共形象錯誤的看法。文章涵括時間爲自文化大革命起（一九六六）到鄧小平掌握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一九七八）止。

由於中共研究資料不足，加上中共官方資料多所誇張隱匿，更有一些杜勉所謂的投機份子（他們基本上完全支持大陸情勢的發展，許多華裔美國學者即如此）、理想主義者（不滿於西方文明的腐化）、以及體系支持者（System-immanentist approach）（認爲任何政治體系均應以其本身規範來衡量，因而大量引用中共官方資料，以 Maurice Meisner 爲代表），使得西方對中共的認識包括「中共革命的結果已使病患和饑餓消失於大陸之上，每一個人均有相當安全保障」（頁七一）等極端偏差認識發生；對於吾人視爲中國人民浩劫的「大躍進」運動以及人民公社運動，也有人給予高度評價，認爲是「打破傳統保守心態與行爲模式」的革命性事件。同樣地，西方研究中共經濟人士曾給予山西的「大寨公社」相當好評，而所有上述有關大陸正面的報導，就連中共本身事後也予相當批評。杜勉也注意到這些學者對於中國大陸人權的低落，以及戕害生靈的草率與受殘殺數字的驚人，却幾無提及。

此外，杜勉也批判盛行於西方、描述中共爲「一政治大國、民粹政權、成功的社會主義國家」、爲「一發展模式」等不實之形象。

最後，杜勉提出了矯正此種偏態的一些建議，亦即彼所謂的「基本原則」（Ground rules）。第一，中共研究應該脫離完全仰賴中共官方資料的惡習，給予中華民國這方面研究更多注意；第二，引用中共官方資料時，應持嚴謹的長時期考證的心態，不應視爲當然；第三，研究應深入社會與政治實際，避免空泛陳述；第四，隨時提醒自己，研究對象爲一封閉的、單一意識形態的、一黨專政的「國度」；第五，研究應免除價值好惡的判斷。

夏里瓊（Jon L. Sarii）從人性的觀點出發，強調社會科學不能沒有人性研究的基礎。夏氏主要探討的方向有四；孩提的形象世界與其社會化過程，孩童時期對於成年以後的影響，人類發展的一些準則與模式，以及解釋個人行爲的外在環境與內在認識的相互關係。夏氏所談的是社會化的問題，却與一般有關社會化的著作不同<sup>⑩</sup>。

一般以社會化理論研究中國問題學者，如威爾遜（Richard W. Wilson）或是愛波頓（Sheldon Appleton）都偏重於現階段的分析，且以教科書的內容分析爲主。夏里瓊則涉及歷史，從文化面探討，有關性善性惡、淘氣頑皮、與時、命、運等皆有觸及。

該書最後一章是由鄭露西（Lucie Cheng）親身在中國大陸作實地研究工作經驗，撰寫而成的一種類似「工作手冊」的短文。鄭氏除了對該研究計劃的源起，爲何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選擇廣州台山地區移民歷史作研究，並選定位於廣州的中山大學爲合作對象有所交待以外，並對外界與大陸學術合作計劃的得與失、或曰甘與苦有所說明。

由於社會科會在大陸上，仍處於萌芽階段（鄧小平上台以後才有計劃地開始推動），雙方合作不易洽合。因此，在大陸從事實地研究的第一個困難在於找尋得當的對手的不易，西方學者往往必須代爲訓練研究人員，增加時間與金錢上的開銷。第二，中國大陸是一閉鎖社會，一般合作計劃不易達成。第三，基於以前學術與政治的敏感關係，許多研究題目仍爲禁忌，大陸學者寧可不去碰觸，也不願干冒風險。許多資料爲「內部參考消息」，取得不易。第四，大陸社會仍然極度貧窮，研究經費不足，在社會科學方面尤然，研究機會自然不多。第五，由於衛生、烹飪設備距離西方標準懸殊極大，非爲一般西方人士所可想像（如無自來水，必須蹲毛廁等

）；也因此，大陸學術單位常羞於接納合作計劃。第六，大陸學術機構不願負責外人之生命及其他方面之安全保證。第七，龐大的官僚體系造成種種關卡，若要求得突破，必須有「關係」或有力人士支持。作者本身為華裔，且通曉廣東話，即使如此，行政上的障礙仍然極為深廣。

### 五、大學學術環境的重要

中共研究的歷史已有數十年，著作出版也不可謂不多，雖然西方一再檢討「究竟那裏出了毛病」(What's wrong with China Studies) 為何研究或分析的結果在十年或相當一段時間以後會完全遭受否定？許多西方學者對「三面紅旗」「農業集體化」「文化大革命」當時的錯誤判斷，事後回顧起來，確實十分難堪，然而截至目前為止，這項遺憾似乎尚未獲得矯正，許多人仍然繼續探尋一個正確的入門途徑。

另一方面，中華民國有關中國大陸的研究，三十年來却少有變化。假如說大陸研究算是「區域研究」裏頭一支隸屬於政治科學之下，顯然吾人的方向缺乏基礎，沒最顧及較大層面的學術環境發展趨勢。這一方面，即便是西方學者，也有實際困難，此為「區域研究」所面臨的一項共同問題，亦即無法同時兼顧大學學術環境的發展與小研究區域的現況。畢竟，人類精力極其有限。

在上述缺陷下，目前中共研究距離成爲一門「學術」科目的理想，可能爲時尚早，值得努力的地方仍多。當然，陳述與批評要比實際執行輕鬆許多。「中共研究方法上的幾個問題」一書至少把某些重要的出現於西方的偏頗觀念指了出來，自然有其值得珍視的一面。站在一自由中國人的立場，尤其歡迎類似的努力。雖然書中某些立論(比方說實地調查一章)，限於當前局勢，非中華民國學者所實際需要，却也可以提供另一種層次的認識。最後，必須指出的是，大陸研究路途仍遙，荆棘仍多，自滿尚早！

### 註 釋

① Chalmers Johnson, "What's Wrong with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 *Asian Survey* 22:10 (October 1982): 919.

② Lucian w. Pye,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1981).

③ 地理政治，辭源於中國大陸不同地區或省籍常會形成一種粗淺的政治勢力組合，這種因爲地理位置的關係造成的政治團體，並進而影響政治運動之情況西方人將之稱爲地理政治。

④ Chalmers Johnson, "The Role of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Scholarship," *World Politics* 17:2 (January 1965): 256-57.

⑤ 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以及 John K. Fairbank, "Dilemmas of American Far Eastern Policy," *Pacific Affairs* 36 (Winter 1963-64): 433.

⑥ Tai-Chün Kuo and Ramon H. Myers, *Understanding Communist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5), p. 10.

⑦ 此點賀氏在其著作 *Political Pilgrims—Travels of Western Intellectuals to the Soviet Union, China and Cuba* 中有詳細記載。簡要立論可見賀氏來華，於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三日演講，而由亞洲與世界社編輯而成的 *Misperceptions of Communism in the Western World*。

⑧ 白魯詢有中國文化「權威危機」的觀念已廣爲流傳，著作包括 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68)；及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所羅門 (Richard Solomon) 的作品有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Mao's Effort to Reintegrate the Chinese Polity: Problems of Authority and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 Process," in A. Doak Barnett (ed.),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attle, Wash.: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兩人皆從心理層面探討中國文化。(上轉36頁)



六年四月，他和項子明等又成爲鄧小平休息活動中的玩伴，彭真的機要工作領導人，也是鄧小平與彭真在若干政治活動中，穿針引線的得力助手。如楊尙昆安裝錄音設備，紀錄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的談話，包括「國家的核心機密」<sup>⑧</sup>，被毛澤東發現後，很氣憤。楊尙昆找鄧小平幫他說話，鄧怕直說會暴露他包庇楊尙昆的「禍心」，就讓他找彭真，求彭向毛澤東說話，於是楊尙昆就通過鄧小平牌桌座上客項子明，轉告彭真，「耍弄權術」，讓項子明出面寫材料交劉仁（當時之中共北京委第二書記）、鄭天翔（當時之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轉送給他們。這樣，彭與鄧合伙包庇了楊尙昆，又開脫了自己<sup>⑨</sup>。「文革」後，王漢斌又成了彭真工作中的得力助手，當然也是鄧小平的心腹。因此他夫婦二人官運亨通，地位不斷升高。

註 釋

- ①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第五屆全國人代會第五次會議通之「憲法」第五十七條。  
 ②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第三十三條。

（上接88頁）

- ④ Waton Fried, *Fabric of Chinese Society*: The Study of the Social Life of a Chinese County Seat (N. Y.: Praeger, 1953). Francis Hsu, *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Kinship and Personality and Social Mobility in Village China*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67).  
 ⑤ 譬如 Richard W. Wilson, *Learning to be Chinese: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Children in Taiwan*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70), 與 "The Learning of

- ③ 同②組織法第二十四條。  
 ④ ⑤ 同②組織法第二十五條。

⑥ 「憲法」第六十五條。

⑦ 第四屆全國人代會常委會初選姬鵬飛爲秘書長，並非副幽員長兼任，其後，改爲兼任。

⑧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一日。

⑨ 中共「北京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總部、政策研究室紅旗戰鬥隊」，「揭開鄧小平搞『裴多菲』俱樂部的黑幕」，紅衛兵報，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

⑩ 「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

⑪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二日，「新華社」北平電

⑫ ⑬ ⑭ ⑮ 同⑨。

⑯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一日，「雲南人民廣播電台」。

⑰ 北京日報，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八日。

⑱ 紅衛兵報戰報，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

⑲ 同⑨。

Political Symbols in Chinese Culture,"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3 (July-October, 1968): 246-254. Sheldon Appleton,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on Taiwan," *Asian Survey* 10 (October, 1970): 910-923, 與 "Regime Support Among Taiwan High School Students," *Asian Survey* 13 (August [1973]): 750-60. Charles Price Kidley, Paul H. B. Godwin, and Dennis J. Drolin, *The Making of a Model Citizen in Communist China* (Stanford, Calif.: The Hoover Institute Press, 1971).